

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河南红枪会的活动

梁福烈[韩国]

(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南京 210005)

前言

民国初期,土匪活动频繁,民无宁日,生产受损。加上军阀连年混战,苛捐杂税层出不穷,自然灾害严重,广大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。这时,由于用火器武装起来的匪帮活动日益猖獗,对那些仅仅要保自家和护乡里的老百姓来说,“排枪排刀”的武艺就显得十分重要。而且在经济落后的农村社会,宗教是团结农民最有力的工具,于是借宗教的力量,团结人民的红枪会等原始农民武装组织,便纷纷出现于华北地区,其活动以河南省为最活跃。

由于分散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影响,以及农民的守土保家观念,初期红枪会的组织一般地带有地域性,而且内部组织是很散漫的。自民国十年以后,因各地匪患日炽,加上日益加重的捐税,破坏了农村经济的基础,需要应付大股土匪的抢劫和军队的苛捐杂税等事情,于是红枪会开始联合几个村或几个县,才形成有系统的组织。^[1]红枪会以村、镇为基本单位,设会长或团长;几个村合为大会或联庄会,设总会长或总团长,也有用军队名称如督办、总司令、统领的,主要负责军政事务。另有法师(或称老师)掌管教务,负责神事和练功。

红枪会内部的派别很多,如坎门、乾门、离门,还有黄枪会、黑枪会、黄沙会等多种组织,这些不同的组织,在信念、念咒、画符、吃符上没有什么不同,在以红枪、大刀、钢叉等

旧式武器作为自卫的武力也没有什么不同。红枪会只是这一类农民自卫武装的代称,在不同地区,他们的名称以及仪式、服饰、姿态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异。他们最初所用抵御的器具,并不是枪炮子弹,只不过是些农具和粗笨的刀枪,到了后来,因为常常和土匪、败兵、正式军队相接触,夺取许多军器。还有有能力的人自己购置快枪,也有富户为了保护身家购置大量的武器,发给佃户,担任地主住宅和乡村的保卫。他们平时也不讲战斗,也不讲训练。只要听了警炮声,便一齐带着器械向放炮的或事先约定的地方走去打敌人了。他们虽然不懂阵势和地势,但上阵却是异常勇敢。因为他们既有枪弹不能入身的自信心,复有上阵后而后退或回了头便会被神罚而为枪弹击死的戒惧,甚至当着紧急大战时,老师和团长,都在后面监阵,见有退缩的便亲自击死,所以他们上阵时,都是不顾一切的向前打。

北洋军阀统治时期,河南红枪会活动可以分成两个阶段,以胡憨战争为其界限。胡憨战争以前红枪会主要活动在于抵御土匪和剿匪方面,胡憨战争以后主要活动转变为拒纳苛捐杂税。

胡憨战争以前

胡憨战争以前,红枪会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:从民国

初期至1920年直皖战争前后为其产生时期;

从1921年至胡憨战争为其发展时期。产生时期的名称不叫红枪会,而称金钟罩或硬肚教,到1921年左右,因他们用的刀枪都系红缨,因而被称为红枪会。而且红枪会的宗教仪式等都沿袭硬肚教。后来又为了避开政府的严禁等原因,有的红枪会名称又改为民团、保卫团、红会、红学等。

1. 红枪会组织的产生时期。到了民国初,由于用精锐武器的土匪蜂起,金钟罩的刀枪不入的功夫,更被乡里的老百姓重视,于是,金钟罩作为抵御土匪的工具,在乡里传播下去。但是,1916年以前的金钟罩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。这因为,不但政府严禁过金钟罩的活动,而且老百姓也视金钟罩为异端。当时土匪的活动,带有“打富济贫”的传统土匪特征,而且一个匪帮土匪的人数,一般只有几十人,多时也只有几百人。他们的活动,多为夜聚明散,抢劫手段多以贴帖子勒索为主,虽有发展到抢劫的,其地点则为小村和单门独户,因大村人多,势力大,因此土匪不敢去。

但是,随着1916年袁世凯的去世,中央控制能力衰落,北洋军阀集团开始分化,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,敞开了土匪生存的空间。这时土匪为祸手段发展为明火执仗的“起票(即绑票)”。许多富户因被贴帖或遭遇其他抢劫手段,浮财不多了,只好变卖家产赎人。大户家家自危,便搬入城里。大户一走,二户便成主要的抢劫对象,也随之搬进寨里。大户、二户一走,殷实一点的小户就成了砧上肉。

土匪的抢劫,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。有的村庄,受到土匪的几次抢劫后,为避免再受劫掠,一方面重修村寨,加固墙垣,另一方面成立了金钟罩,并添购了洋枪,加强防御。在民国五六年间,豫东归德(今商丘县)一带,就有硬肚会的组织,以后逐渐向豫西及豫南的西部发展。^[2]这个时期传授硬肚教者,多来自山东曹县、单县、东明县。

土匪的猖獗,也使官府的财政和军阀的军饷受到严重影响,因此,有的县就成立了民团。但是,大部分土豪劣绅包办的保卫团或民团,其经费也强取于农民,这样的民团,就成了土豪劣绅的腐败和集合场所。^[3]有的乡里也成立了乡团,但因需款多,且往往内部发生意见,不能持久。从而,人民以金钟罩为护符,刀枪不入的金钟罩就成了抵御土匪的唯一武器。

2. 红枪会组织的发展时期。这个时期的河南在直皖战争及两次直奉战争中,深受其害,促使红枪会蜂涌而起。首先战争之后,灾害重重,逼得穷苦农民无路可走,与其坐以待毙,不如结伙拉杆。尤其是1922年的冯赵战争后,宏威军和巡缉队溃败为匪,出现了像老洋人那样大股兵匪猖獗的时代,如赵倜垮台仅一个月,就有30个县城遭到兵匪的蹂躏。^[4]其次,战争规模的扩大,不断补充兵源需要,为土匪收编入伍提供了好机会。而且这样收编的大批土匪,则仗着官兵的身份,为所欲为,无法无天,这导致了官军的纪律极度败坏。加上官匪时降时叛,反复无常,于是土匪日益增多,四方乡民乃发起组织红枪会,专事防匪。

这个时期红枪会有以下特点:

第一,有红枪会的地方,土匪敛迹,溃兵就范,地方转为安宁,其他地方也纷纷效法。于是,红枪会等自卫组织向河南各地传播。到1923年前后,红枪会等组织,几乎遍及各县,红枪会人数多的地方,甚至一县有近一万人。^[5]

第二,开始与军队冲突。河南地处中原,很有战略价值,自赵倜统治以来,河南兵额多至十几万,吴佩孚第一次入豫,兵额增至二十万。随着兵额的增加,农民负担逐渐加重,尤其是驻军多的地方,其负担不堪设想。如从1923年8月起发生的卢氏县人民与陕军赵树勋等部之间的三次冲突,是最明显的例子

之一。^[6]

第三,1921年以后,红枪会的传播和发展迅速,势力日大,加入红枪会者日益复杂,地痞、流氓、散兵游勇、土匪等都有,而且寨首、族长、土绅的领导地位下降,其领导权转移到土豪劣绅手中。由于领导权的转移,以致部分变货为土匪组织的红枪会,渐越规矩,杀人放火,抢劫财物,演变成为会匪,与土匪无别。^[7]

胡憨战争 以后

随着连年不断的战争,土匪更加猖獗,兵额逐年增多,人民的生活日趋窘困,这导致了红枪会组织的迅速发展

和巩固。各县有了强大的红枪会等自卫武装,从而,红枪会与军队的冲突也逐渐增加,从1926年春起,通过吴佩孚利用红枪会之际,红枪会发展成了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,1926年底至1927年初期是其活动的全盛时期。

这个时期红枪会活动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,以北伐军占领湖北,吴佩孚退居河南作为其界限,其前期为蔓延时期,后期为顶峰时期。

(一) 红枪会组织的蔓延时期

这个时期河南的政局有了急剧变化,而且发生了对农村经济严重破坏的胡憨战争、国吴战争。因为随着战争的频繁发生,河南的兵额逐渐增加而系统复杂,而且各军为了支付巨大的战费和军饷,进行预征和征发苛捐杂税,加上各地驻军对人民横行残暴的行为,引起了人民的愤恨。还有战后,土匪数目急剧增加,捣乱了农村的经济秩序,于是,抵御土匪和抵抗军阀的红枪会组织,向各地农村蔓延下去。

1. 国民二军统治时期的红枪会。胡憨战争虽然短暂,但是战乱波及到全省,而且十分激烈。战争之后,在农村土匪活动的水平已

经达到前所未闻的程度,其残忍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。据何西亚调查,1925年河南省的土匪人数至少在五万一千余人以上,居全国首位。^[8]

岳维峻接任河南督办后,实行四面出击的扩张政策,大肆招收散兵游勇,使国民二军人数由原来四万人急剧增加到二十万人。还有国民三军、宋振标的毅军、樊钟秀的建国豫军等,^[9]此时河南兵额达到二十八万人,仅次于广东、四川而在全中国占第三位。为了筹措军队的给养和战费,岳维峻预征五年的田赋,发行了毫无保障的纸币一千多万元。1925年的税负比国民二军入豫前的1924年增加一倍以上,各军就食于地方之数尚不在内。

军队风纪败坏,官员贪污腐化,这一切引起河南人民的普遍反对,使国民二军成为农民心目中的最大敌人,当陕军在豫一年之间,红枪会势力已日见膨胀。如洛阳一千三百余村,几无村无红枪会学塾,总计1925年全县红枪会众,不下两万人。^[10]

国民二军的剥削越深,红枪会的组织越膨胀,这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冲突。如1925年12月陕县第二区温塘村红枪会聚众劫夺国民二军辎重、车辆,获手枪百余枝。是月二十二日,南原红枪会百余人,夜赴会兴镇,谋劫驻军枪枝,军队起而对打,巷战彻夜。^[11]

2.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的红枪会。吴佩孚趁河南农民同国民二军的矛盾日益激化之际,仍想回其洛阳老巢,于是,利用河南红枪会势力,采用了三种方法:一是对于那种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红枪会,吴佩孚派代表许以他们将国民军赶走后,免除农村中一切捐税;二是对于那种土匪溃兵的红枪会,吴佩孚便给以师长旅长一类的委任状,当时河南师旅长及混成旅长司令一类的官各有几百个;三是用以上两种手段都不能的红枪会,就提出“打倒老陕,豫人治豫”,号召河南人起来赶“老陕”。^[12]

1926年1月21日,吴佩孚发表讨冯通电,出兵三路进攻河南。红枪会遂在吴佩孚进攻岳维峻的过程中,从内策应,扰乱国民军后方。他们忽聚忽散,陕军人少则与战而夺其枪,陕军人众则各返其宅,仍为良民。岳维峻、邓宝珊等由郑州退回陕西时,尚有三四万人,枪支及大炮装了一百多辆火车,完全被红枪会打得干干净净。^[13]于是陕军一败涂地,最后终于败退。

吴佩孚利用红枪会,驱逐陕军重新入豫后,与各势力之间的矛盾日趋恶化。其主要原因:一是红枪会势力急剧膨胀,成了政治上不可忽视的对象。如杞县红枪会人数,一共有七万五千之多,颇有声势。^[14]二是吴佩孚为筹措庞大的军费,对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。吴军重新进入河南以后,带给农民的是:①苛捐杂税加重,钱粮继续预征。吴佩孚祸豫期间,一年军费就需要1969万元,而当年全省省库收入不过两千万元,仅够支军饷。其他如政费、地方军军费等方面的大量开销,全靠向人民进行额外勒索。吴佩孚为了支付战费,开始提前征收1929年的捐税,有的地方甚至到1930年。④下令解散红枪会,拒绝解散的就遭到屠杀。④钱粮税捐一概征取现洋,以致银行钞票大跌。^[15]

吴佩孚骗用红枪会赶走国民二军后,不但原允免除一切捐税等条件不予兑现,反而增加捐税,预征钱粮、滥发军用券,到处拉夫拉车,派饷征物,剥削程度比国民二军有过之而无不及;同时有些得了师旅长委任状的人战后并没有得到官职,自己原有的兵卒枪弹反被吴佩孚的人提的提了,编的编了。所以河南红枪会恨吴佩孚的心比以前恨国民军更甚。于是,就发生了红枪会为难吴军的局面,既对于登封行政,一味干涉,又事事与省政府为难。而且各县筹收的军费给养,又为红枪会所抗。如豫东杞县等处因其地红枪会有势力,从国民二军在豫时,便从未纳过一点捐

税。但杞县是河南最富足的县份,这样一来省政府的收入大受损失。^[16]于是,吴佩孚令寇英杰于一个月内一律缴完,不得容留。

吴军不仅攻打红枪会,对于当地人民的蹂躏也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,譬如打杞、睢县的红枪会时,李鸿翥部便滥杀无辜屠杀了七、八千人,村庄被烧无数。^[17]类似这样残酷对待当地红枪会和农民的例子在河南随处可见,但红枪会不但没被镇压下去,反而激起了人民反吴的更大决心。

(二) 红枪会组织的顶峰时期

这个时期河南全省的武装农民,约在两百万以上,除了民团一部分外,剩下的都属红枪会,即其红枪会人数不下150万。这时期红枪会的斗争比较有声势,使盘踞在河南的大小军阀,焦头烂额日益不安。这时期红枪会活动的主要特征为:

1. 出现大组合的红枪会。这个时期红枪会联合组织迅速发展起来,联合整个一县或几县的大组织纷纷出现。这是因为人民为了有力与驻军对抗,迫切要求团结各个红枪会组织。如因靳云鹗军苛派给养,预征地丁,勒索军费太重,汝南、正阳、罗山等九县红枪会,实行大组合驱逐县知事。^[18]

2. 抵御预征和拒纳苛捐杂税。因为战争规模的扩大,吴佩孚急需战费,1926年间预征到民国十六年、十七年、十八年之丁漕,于是引起人民的抵抗。如豫西洛阳、嵩县、洛宁、新安、渑池一带红枪会,因为财厅预征丁漕,年征三、四次之多,而且到1926年底又要预征民国十九年之丁漕,加上勒派的兵差给养,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强烈不满,从而联合了豫西十余团,集合了人数有四、五万人之多,声势甚大,驻军不敢与之抗衡。他们誓死反抗预征,故洛阳县一月换了四个知事,也没一个人敢预征。^[19]

3. 驱逐县长。北洋军阀为了筹措自己军队给养的便利,在占领地区的县份内,采用委

派县知事等方法,向人民进行催逼预征、勒派给养、支应兵差等事。而且大部分县知事为了自己发财,实行贪污暴虐的政策,人民对县知事非常愤恨。于是,揭竿而起驱逐县知事。如北伐军进攻河南之际,由于靳云鹗、田维勤等直系残军勒派给养,预征丁地,捐税太重,汝南等九县都被红枪会众占据,这地区的县知事除了有一、两个留任外,完全被红枪会驱逐跑了。^[20]

4. 与军队进行大规模的冲突。吴佩孚军在豫,捐税尤繁于陕军,且兵额太多,系统复杂,自由汉口败退后,更专以河南的财养30万穷兵,红枪会遂与吴军益成仇,此类事迹甚多,不堪备述。如靳云鹗所部的十一师庞炳勋部,1926年阴历八月,由汉口移驻信阳县东四十里的洋河镇、黄家院一带。因兵额既多,饷糈又无着,一切给养,尽由地方供应,居民不堪其苦。而且庞部奉靳令开拔北上,临时又在各村拉夫派米,非常严苛,该地红枪会因此聚众反抗,庞部被红枪会包围五日。这一仗军队方面,死一名团长、一名营长、三名连长、排长兵士共五十四、受伤者很多。红枪会方面,死八人,伤二十五人。冲突的结果,庞部只好移驻他处。^[21]

5. 阻碍奉军入豫。1927年2月盘踞在直隶等地的张作霖部分兵三路,从直隶进击河南,奉军的两师先头部队,从京汉路南下,但于2月1日在磁州为红枪会大败,几乎全军覆没。^[22]当奉军到达彰德正往前进的途中,豫北红枪会又把漳河铁桥炸毁,破坏了奉军的必经要道。奉军2月4日动员入豫后,其行军颇有艰难,因为豫省人民皆成“红枪会”化,稍一疏忽,即有变生肘腋之虑。磁县到新乡,仅三百余里,平均每日仅行十余里。^[23]而且河南各地的红枪会在奉军所占地不断暴动,扰乱奉军后方,牵制着奉军的不少力量,红枪会就成了奉军入豫后难以立足的心腹之患。

6. 帮助革命。武汉政府与奉军的争夺战中,红枪会积极配合,如奉军由漯河一带退却之时,红枪会集合十余万人,沿途截击,奉军无退路,狼狈逃散,枪枝沿途抛弃。^[24]又在陈留、通许、杞县、商水、周家口一带,红枪会缴获奉军枪械万余支。5月15日,冯玉祥所率的第二集团军在红枪会协助下,围攻洛阳,26日得以攻克。28日,北伐第四军、十一军发动临颍大战时,也得红枪会多方协助。^[25]北伐军从5月初会师入豫,到6月1日北伐军与冯玉祥在郑州会师,仅一月余的时间,即击败了进攻河南的奉军,得红枪会等农民武装之助实为不少。

结语

初期的红枪会是反对溃兵土匪扰掠农民的,所以红枪会武力强大的地方,很少被外来的兵匪骚扰,俨然成了农村的自卫军。后来,因为官兵无能力剿匪,而且有相当部分的官兵非但不认真剿匪,反而为图谋私利,以泄漏情报、出售枪枝弹药等种种方式资匪,甚至也有官兵利用匪祸,趁火打劫。于是红枪会势力逐渐强盛起来,终于达到与军阀抗衡的地步。红枪会与军阀冲突中,除了取得了有效的效果外,付出的代价也不少,如1927年的4月下旬,偃师、新安等一带的红枪会被刘镇华洗劫了五十四个村庄,被屠杀者也达二千多人。^[26]

红枪会势力日益强盛起来,难免一部分红枪会组织的分化和变质。1921年以后,红枪会势力逐渐增大,就成了剿匪的有力手段,加上一部分地区的富户和中产人家,为了防范兵匪的劫掠,对红枪会提供捐助,于是,在红枪会组织内,散兵游勇、地痞流氓、土匪等分子都混入,使一部分红枪会的纪律一落千丈。而且,吴佩孚利用红枪会驱逐国民二军后,屡次严禁的红枪会就变成与大小军阀合作的对象,从而,土匪、野心家相率起来组织

红枪会等团体,以图号召,而谋荣利。加上因落后的农业经济反映而成一种狭隘的村落主义、乡土主义,这种农民的守土保家观念等原因,把红枪会分化成了许多不同的性质,从对农民的利益上,大略可分三种:¹最好的红枪会是专打溃兵土匪,他们在有事时便聚集在一处听领袖的指挥,无事时仍各人种自己的田,领导与一般会员之间除了宗教和战争等事外,没有权力上的界限。④次好的便是他们亦是抵御兵匪,保卫农村中一切农民治安的,但其领袖的权威太大。其领袖几乎握有会员的生杀予夺的权力,而且他们的生活特别奢侈。④最坏的是土匪性质的少数红枪会。溃兵土匪与土豪劣绅相勾结,便自命为当地的红枪会,他们亦抵抗外来的兵匪,但是对当地无势的农民剥削,与外来的兵匪并不相上下,而其战斗力是所有红枪会中最强的。^[27]由于红枪会的分化,也偶尔发生了互相残杀的械斗,如洛阳红枪会城内派与城外派的冲突,陕州一带白枪会与红枪会的冲突等。^[28]但是,总的来说,红枪会是为农民利益的自卫组织。

大革命失败和蒋介石、汪精卫叛变革命后,冯玉祥厉行白色恐怖,在各处抗捐税的红枪会、天门会,均遭受很大的屠杀,但把自己可以控制的红枪会改编为豫东、豫西、豫南、豫北四个民团军,委任一批军阀和大小地主(原红枪会领袖)为民团军的军长等各级军官,作为豪绅地主阶级的武装力量。经过冯玉祥对红枪会镇压和收编,遂使红枪会势力日衰,再度转入秘密状态。但是抗日战争暴发后,潜伏于河南各地的红枪会又重新组织起来,配合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开展游击战争,在抗日战争中,作出了贡献。至抗日战争结束前后,方基本消弥,几乎与民国相始终。

注:

[1]向云龙:《红枪会的起源及其善后》,《东方杂志》第24卷第21期,1927年11月10日。

[2]郑振宇:《河南农民状况报告》,《汉口民国日报》,1927年3月19日。

[3]《河南农民协会成立宣言》,《农民运动》第3期第12-15页,1926年8月17日。

[4][英]贝思飞著,徐有威等译,《民国时期的土匪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2年,第271页。

[5]《晨报》,1923年4月26日。

[6]仁静:《河南卢氏县人民对军阀之反抗》,《响导》第69期第551-552页,1924年6月11日。

[7]戴玄之:《红枪会》,《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社会》二册第364页,台湾商务印书馆。

[8]何西亚:《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》,第89-94页。

[9]文公直:《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》上册,第184-188页。

[10]《晨报》,1925年9月22日。

[11]1936年《陕县县志》第一册大事记。

[12][13][16][27]第六卷第一号(126期)第9-17页。

[14]《河南省农民运动报告(1926年6月)》,《中国农民》第8期第41-55页,1926年10月。

[15]守愚:《直系余孽对河南民众之剥削》,《响导》周报,第186期。

[17]潇湘:《河南红枪会被吴佩孚军队屠杀之惨状》,《响导》周报,第158期第1545-1546页,1926年6月16日。

[18][19]《晨报》,1927年5月14日,1926年12月18日。

[20][21]天津《大公报》,1927年5月14日、3月19日。

[22][23][24]《汉口民国日报》,1927年2月11日、3月29日、6月2日。

[25]罗宝轩: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枪会》,《社会科学战线》,1982年4期·历史学。

[26]罗宝轩: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河南红枪会》,《近代史研究》1982年第三期。

[28]李大钊:《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》,《政治生活》,1926年80、81期合刊。

〔责任编辑:兆 录〕